

对于中国人来说,相对于元旦,春节才是年,而且过年就是过团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老百姓们非常认可的一个理念。

记得我当兵在外地,1978年才调回沈阳结束两地分居生活,当时家住皇姑区淮河街小白楼我爱人单位一个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小二楼,小二楼里住了很多家,我家四口人,9平米,阴面,终年不见阳光,三家共用一个厕所,两家合用一个厨房。那时到楼下铁路商店买菜买肉都是凭票的。过年除了包饺子之外,总要有娱乐活动啊。我们家有一台老式收音机,右上角有一个小小的窗口,打开时呈绿色光亮,可以收听文艺节目,但时断时续,断的时候在上面拍两下,就又接续了。邻居吴家有五个孩子,老吴大哥是工厂制材车间的工人,他心灵手巧,春节前自己安装了一台9吋黑白电视机,令整个楼的邻居十分羡慕。除夕的晚上,我带着海泉,同十来位邻居自带小板凳挤到吴家看热闹,年仅3岁的海泉对这电视机充满了好奇:人怎么能在这么小的框子里又唱歌又跳舞呢?

仅仅过了两年,1980年,我国改革开放起步了,城乡百姓的日子有了明显改善,买菜买肉不用票了。这一年,我们住进了军区机关分配的两室一厅的房子,有了日立牌12吋黑白电视机,效果比吴师傅自己安装的自然清晰多了,音响也好多了。除夕之夜,我们一家四口围在电视机前看文艺节目。那时央视春晚还没开始,也看不到几个频道,但这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了。又过两年,海泉上了小学,除夕晚上看的电视机换成19吋松下彩电了,能看到五彩缤纷的文艺节目了。

印象深的是1983年央视有了春节联欢晚会,从这一年起,家人包饺子后的兴趣和愿望就是看春晚。在1986年央视春晚晚上,看到王刚与方舒、姜昆同为主持人,11岁的海泉很兴奋,因为王刚曾是我们军区的曲艺演员,曾与我一起去西沙,曾在电台、电视台和诗会上朗诵我的诗,也曾来我家做客,还与海泉、海英有合影呢。看见熟人上了春晚,一下子就感到春晚与我们很近了!

年年除夕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这几乎成了一个盼头。没有料到的是,春晚跟我们越来越亲近了:海泉和羽凡作为流行乐坛新人,在2001年以一曲《彩虹》上了春晚。海泉没和我们一起包除夕饺子,但在初一早上还是赶回家过年了。2002年,羽泉与台湾歌手王力宏合唱一曲《美丽新世界》又上了央视春晚,并在这年的元宵晚会上演唱了一首《开往春天的地铁》。今年春晚,海泉和羽凡又一次登上春晚舞台,他们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表演一个反串节目,于魁智演唱他们的《奔跑》,他们演唱了于魁智的拿手戏《三家店》,让传统京剧与流行音乐交织成趣。

最让我兴奋和难忘的是2012年,海泉说,今年除夕我又回不去了,爸妈你们来北京和我一块过年吧!我和老伴就到了北京,没想到海泉要带我们俩,同羽凡、白百合一块上央视春晚演唱东北民歌《小拜年》!起初,我们百般拒绝,海泉动员我们说,这就是家人在一起过年啊,也给全国人民拜年,多好啊!我穿的衣服裤子都是在海泉衣柜里临时选的,老伴的衣服就是平时在家做饭穿的。我们表演完了,就坐在台下圆桌看春晚节目。我环顾四周,那么多都是脸熟的名角啊!从进央视演播大厅那一刻,手机全关了;等春晚结束,已经是大年初一凌晨了,海泉开车带我们回家经过天安门时,我打开手机,看到短信爆满,都是亲友发来拜年的,为我们上了春晚而高兴、而祝贺……

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在胜利情绪鼓舞下,3月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此时,红军正集结在苟坝所在的枫香镇和鸭溪一带,寻找战机,待时而动。

3月10日1时,林彪从前线给军委发来“万急”电报,称驻守金沙县的敌军是我军手下败将王家烈部队,建议立即攻打县城打鼓新场,并拟定了具体的兵力部署和进军路线。朱德接到电报,认为攻打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赞同林彪建议,而毛泽东则认为,金沙县城城坚壕深,易守难攻,且有敌人两个师的兵力守卫,贸然行动绝难取胜,故极力反对。前敌司令员和政委发生分歧,这真是给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和“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出了个不小的难题。

于是,张闻天立即在四合院堂屋召开有政治局成员、军委委员、军委局级干部20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林彪建议。会上,绝大多数同志和红军战斗员一样,迫切希望以新的胜利创建云贵川根据地,纷纷赞成“打”,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在反复申述意见得不到认同的情况下,又犯了湖南人的脾性,竟以“这前敌政委不干了!”相“要挟”。对此,有人同样犯倔:“不干就不干,少数服从多数!”争论异常激烈,气氛益发紧张,最后只好付诸表决。结果可想而知,毛泽东不仅意见遭到否决,还丢掉了只当了6天的前敌政委的“官衔”。

回到住处,毛泽东神情黯然,“夜不能寐”。恰在此时,接到军委二局和三局送来的情报及敌军往来电报的破译稿,情况表明,蒋介石正在频繁调兵遣将,构筑防线,准备东西并进,南北夹击,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一场关乎3万红军命运的危机一触即发。毛泽东心急如焚,连忙提着马灯,摸黑夜路,跌跌撞撞、气喘吁吁地敲开周恩来的房门。周恩来刚刚起草完准备明天一早便要下达各部队的作战命令,听了毛泽东的汇报,大吃一惊,遂与他一起来到朱德住处,经过商量,取得一致看法,于是再次召开中央军委,决定放弃“硬打”的计划,毛泽东刚刚被剥夺的前敌政委,又官复原职。

这戏剧性的一幕,在中共党史上或许未及详述,但在毛泽东记忆中从没有淡去。

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讲到“工作方法”问题时曾说过:“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会,听了我的。”

毛泽东此处所说的“要到四川绕一圈”,正是他知己知彼、避开强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构思。苟坝会议后,“运兵如神”的毛泽东即巧妙排兵布阵,挥师茅台,于3月16日、17日三渡赤水,继而调头,夺取遵义,又“分兵马鬃岭”,虚张声势,掩护主力红军南下,接连取得突破乌江、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的胜利,终于把3万多名红军带出蒋介石40万大军的包围,踏上“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新征程。

杨生国在谈及这段历史时,以归结性的语气感叹:“看来真理有时真在少数人手里。”

好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人们忘记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由此想到,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一生追求真理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特定的境况下,阅人论事,审时度势,也难免判断失误和举措失当。

黔北之行,耳目一新。所见所闻,感触自多。今年便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和茅台酒巴拿马获奖100周年,能有机会身临其境温习历史记忆,体察时代脉动,也算一次收获不菲的远足,是以为幸。



黔北往事
胡世宗

绝:赤水河畔清泉水,琼浆玉液酒之最。天涯此时共举杯,唯有茅台喜相随。

光阴似箭,时移势易,历史的逻辑正如毛泽东所言:“人间正道是沧桑。”7年之后,已是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南京招待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两人抚今追昔,感慨尤深,遂又即席赋诗。陈毅吟道: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赋诗传韵事,雪压江南饮一杯。黄炎培和道:万人血泪雨花台,沧桑回客去来。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

江山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些见诸正史和报刊的历史珍闻,苦乐交织,记载着来路的艰辛与人情的温暖。因缘和会,又总予人“执大象,天下住”的启迪与激励。

返回遵义时,按行程安排,是要顺道去一个叫“苟坝”的革命旧址参观。“苟坝”?这在众人的党史常识中显然十分陌生。陪同解释说,那里离茅台镇很近,景色又很好,非常值得一去。

果然是一个地势开阔而又风光秀美的小平原,在多山的贵州十分少见。四围青山隐隐,远近阡陌纵横,十多个村民小组散落在茅麦花、油菜花、格桑花盛开的原野间,相距都约里许。显然经过新农村建设的“打造”,民房焕然一新,皆为白墙黛瓦的小楼。村间小路多以水泥、石板铺就,路旁偶见供行人饮茶小憩的凉亭。时值晚秋,清风习习,漫步其间,游目畅怀,确是一处天高云淡远离尘嚣的休闲胜地。镇党委书记讲,自建成红色旅游观光点,每年至少接待50多万游客,村民人均收入已达9000多元。

旧址在远处的马鬃岭山脚下,为黔西一带传统的木结构大型四合院落。据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生国介绍,没有在这里召开的军事会议,就不会有随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中国革命的进程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夺娄山关,取得突围转移以来首次重大胜利。3月4日,中央军委特设前敌司令部,

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由中国政府选送的陶瓷、漆器、珐琅彩、丝绣、编织等手工艺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眼球。人们流连在这些美轮美奂的展品前,以旖旎的想象揣度着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翘起拇指,交口称奇。

而在人头攒动的农业馆,那排泥黄色的茅台酒瓶就显得灰头土脸,少有人问津。中国参展团领队陈祺经过思量,认为如果将它放在食品加工陈列馆,应该是能引起关注的。就在工作人员移动展品时,一瓶茅台酒从展架上猛地掉了下来,随着一声冰裂的炸响,一股馥郁的浓香扑地而起,立即四溢开来,弥漫到整个大厅,人们于是调头回身,闻香寻迹,纷纷围拢过来……结果,这种以独特工艺酿造的白酒,在有41国参与的博览会上,毫无争议地由高级评委会直接授予金奖。

对这段往事或许会有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自1915年在巴拿马博览会获得金奖,与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蒸馏白酒,近百年来,茅台酒始终以其固有的品质和良好信誉,以及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内政和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重要节点有过的密切关联,被尊之为“国酒”,当是不争的事实。

那天参加完酒厂的重阳祭酒大典,雨后的晚霞余晖中,我们来到红军四渡赤水的渡口。“四渡赤水”,这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出神入化的得意之作,他硬是在险象环生的危急关头,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巧妙调度,成功地将中央红军带出蒋介石的重重围困,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奇观。

想起黄炎培先生那首不无诙谐的《茅台酒歌》: 喧传有客过茅台, 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吾不管, 天寒且饮两酒杯。

我问讲解员真有洗脚一说吗,小姑娘笑笑,说完全是瞎编乱造。事实是,1935年3月16日三渡赤水前夕,毛泽东和军委首长来到突击架好的浮桥上,边走边夸“工兵连有办法”,当时正有几名警卫员捧着从酒厂买来的竹筒散酒走来。毛泽东问,你们扛的么子? 陈昌奉答,王连长搞了点酒,给大家揉揉腿脚,消消伤。毛泽东笑说,茅台出名酒,不过用来揉脚,太可惜了……

其实,我何尝不是明知故问!我当然没有提到黄先生的那首诗,也没有讲那首诗的由来。

1945年7月,黄炎培与其他几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曾与毛泽东就如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作了著名的“窑洞对”。这件事通过黄本人所写《延安归来》及此后大量文艺作品的征引,已广为流传。鲜为人知的是,就在那次访问期间,还有一段有关茅台酒的佳话。

黄炎培等到延安次日,即与毛泽东在枣园会面。走进会客室,客人们赫然发现,窑洞墙壁上挂着一幅画,为沈钧儒先生的次子沈叔羊所作,上面画一个酒壶,上书“茅台”二字,旁有几个酒杯,而画上的题诗,正是黄炎培亲写的那首《茅台酒歌》。这幅作品作于1934年,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造谣滋事,掀起新的反共高潮之时,题诗中一个“喧”字,委婉地讥讽了谣言的荒诞与无聊,一个“客”字,又暗含对红军将士的信任与尊敬。黄先生见到这幅画,睹物思人,如遇老友,一种对共产党重情重义的知遇之感油然而生。

是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茅台酒宴请黄炎培一行,宾主推诚布公,相谈甚欢。席间,陈毅看众人兴致正高,提议大家依黄先生酒歌原韵,联句为诗,以纪雅聚。于是公推毛泽东起首,他略作推让,随即吟道,“延安重逢饮茅台”。周恩来接句,“为有嘉宾陕北来”。黄炎培或是出于幽默,或是谦逊,仍用旧作原句,“是假是真我不管”。陈毅只好接应,“天寒且饮两酒杯”。毛泽东见状,哈哈大笑,连连摆手说不算不算,随又换韵起句,其他人仍依次承接,重新联成一

甲午岁末杂咏

肖复兴

贺袁鹰先生九十寿

老木浓阴对晚霞,深流静水到天涯。
鸟鸣暖树相成曲,雪打寒窗自结花。
九十年间文浩荡,八千里外梦横斜。
曾带着袁鹰所著《风井冈翠竹帆帆过,伴我青春泛泛槎》。帆》到北大插班队。

念孙犁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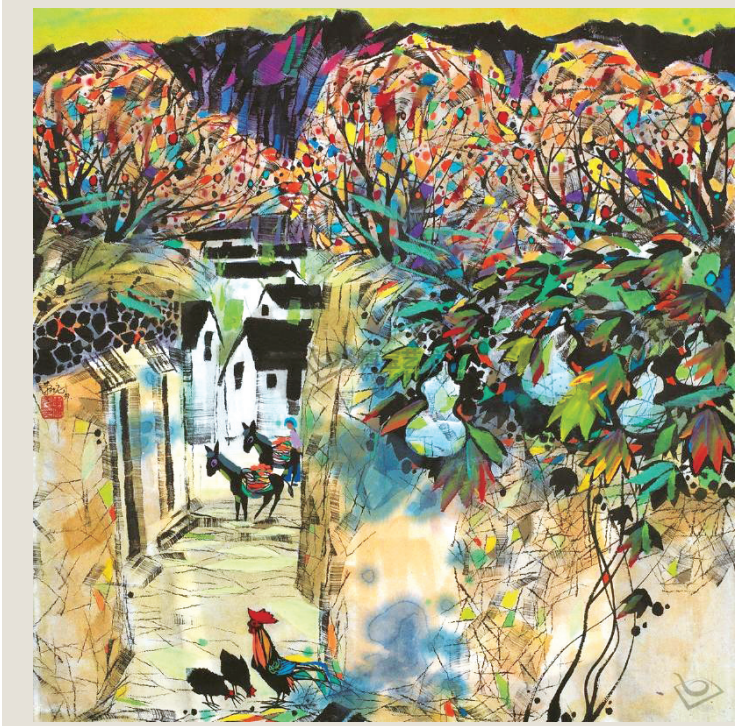
大道低回铁木青,耕堂浣水自风清。
粗茶淡饭伴四季,草履布衣行一生。
衰病犹怀天下事,老荒未废纸间声。
百年浮世文章在,映日荷花别样情。

咏羊诗

张辛

一
柔外而中正,
说亨故利贞。
易言为象况,
诗美鹤巢功。

二
维群无失类,
取贖不鸣声。
荷垂而随意,
祠神以富生。



乡村小景 李付元作

团结湖

杨建英

我们村的老人把良乡叫做“县”,把去良乡叫做“上县”。

村西头王树德他妈活着的时候,人们便接长不短地看到她收拾一新,挎着个小竹篮,颠着一双小脚儿到良乡看她聘在西北关的老丫头去。

村人见了总是要问:“大妈,您这是嘛去呀?”

“县——去!”王大妈颇为自豪地说。一来二去,村里便多了一条歇后语“王老太太上良乡——现(县)去!”

“现”这个字,在我的家乡可不是什么好字眼儿,几分张扬,几分调侃,有丢人现眼的意思。对此,我的乡亲们可不在乎。良乡是我们的老祖母,在她面前没有什么难为情的——现就现吧!

良乡古来称县,追史,怕是要溯到首开郡县制的秦朝。有出传统京剧小戏《三不愿意》说的就是良乡县发生的故事。

良乡的得名,据说是从“人物俱良”一词取意。然而,我对“此讲儿”不以为然,倒是儿时的一则关于良乡的谜语时常萦怀,说:用“妈油冰棍儿”打一地名,谜底就是良乡——又“凉”又“香”嘛!

如今,阔别良乡30年,每每想到这个词,顿觉清爽沁心,香气扑鼻,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将我淹没。

所谓“人物俱良”的说法,我想应该是民风物产都很好的意思。但从历史上看,良乡县境内名人不多。乐毅算一个,贾岛算半个,姚广孝是个阴谋家,孟良、焦赞是戏剧小说中的人物……物的方面也不算太好,30年前,良乡闻名天下的物品好像只有糖炒栗子。当然,还有一件东西,名虽不显,但也算得上遍布天下了——

那年我从北京坐三天三夜火车到乌鲁木齐,又坐两天两夜汽车到阿勒泰,真有天边儿的感觉。后插班上学,全班有一半是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蒙古族、回族……同桌是个黄头发的俄罗斯女孩。第一天上课,刚一落座,忽然发现那女孩的桌上放着一个很旧的铁皮铅笔盒。漆面脱落,锈迹斑斑,打开盒盖,在“九九运算式”的下边一个标志——“北京良乡文具厂”赫然入目。同桌说这是她的姐姐们留下来的,她有三个姐姐,

想良乡

杨建英

都已上大学。

后来,我才惊讶地发现全班一半同学的文具盒、三角板、圆规、半圆仪都是良乡出品。想想,一件北京的商品能够销到如此荒僻的所在,称之为遍布天下亦不为过。中国有多少个孩子,正是通过这些不起眼儿的小东西,描画出自己未来的道路。如此说来,这个厂子的功绩与文化意义可就大了去了。

我记忆中的良乡,农业味十足。全城除东北角的修造厂有几栋楼房外,其余都是平房。闹市区是一个被称作“大角儿”的所在。以此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延伸出四条小街,东西短,南北长。沿街建筑均为民国营制,低矮破旧,与满街有菜色的人群相得益彰。这些人大都来自周边乡村,赶集购物,逛街散心,蹲在路边大嚼油饼油条,没人考虑这是“现”或“不现”。

天下城池大都有门,不过在良乡这些门都被“关”取代。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非常端正。偏一点的也特别指明如:西北关。我去良乡大多从西关进。西关据说早年间确有高大的城门,四周还有城墙。在我儿时朦胧的记忆里似乎见过那已经被拆除城楼、残破不堪的高大城墙。稍长,还在良乡二中西边的菜地里,见过一段残存的墙基。

听老人们说,早年间良乡城西门、城墙、护城河俱全。不难推想这是一座依古制而建的城池。《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良乡何时建城,何人建造,又是哪位诸侯王的封地?因手头没有资料,无从查考。不过,我倒认为这座小城是这方土地上的农民们精心种植出的一个硕大的“根儿”。

良乡城自身有一些文物遗存却极少文化积淀,这从良乡官方发布的简介中都可以看出来——“昊天塔、乐毅墓、关帝阁等众多历史文物古迹演绎着良乡悠久的历史文明。”

张谢村的高跷、小营村的小车会等独特的民俗表演、传统的民间艺术,积淀了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谈到文化要拿周边的乡村说事儿,这对良乡来说好像也没什么难为情的。正如周边的村民或穷或富都可以在城中潇洒一样——相看两不厌!这座城与这方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默契是十分惊人的。

对于生活在良乡周边的村民们来说,一种幸福要是不拿到良乡展示一下,那还叫幸福吗?

村里青年男女搞对象,男的用自行车带着女的去趟良乡,到南关的饭店吃个饭;到大角儿的百货商店买几件衣服、几块头巾,扯几尺花布;到良乡照相馆照个相;浪漫一点的还可以到良乡三街的电影院去看场电影,这事儿八成儿也就成了。等到结婚办事儿,酒席上的酒肉要到良乡去置办,新婚蜜月也是两口子去趟良乡逛一圈就算完事儿。再以后,媳妇“有了”,掐算着日子差不多了,爷们儿用自行车把媳妇驮到良乡医院;快过年了,一家三口到良乡东街新华书店买年货,到大角儿的农用日杂商店买“小铁杆儿”“麻雷子”鞭炮,到北街农贸市场买瓜子花生、茶杯茶碗等年货;孩子上学了,争取考上良乡中学……

说真格的,我们虽然地处京西南的远郊区,但从行政区划上说,我们也算“天子脚下”,也是北京人。但是,我们这群京城的“穷亲戚”,真没为它添什么乱。很少有人到北京城去办什么事,所有的事到良乡就能解决,有一座良乡在身边,我们知足了。

但是,从网络上我看到,自从房山区政府迁到良乡之后,这个地方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高楼、大广场、高速路、轻轨……一系列现代符号诠释着良乡现代化的蜕变……魂牵梦绕的良乡啊!

如今,我坐在新疆北部一个闭塞的小山城里写着这些文字,自己都觉可笑。以我们这个边塞小城现代化进度推断京畿之地的良乡城变化,我的这些思念简直就是梦话。

老良乡从此不再。还好,她会长留在我心中。

唉!啥时可以回到家乡啊,带着老婆孩子,收拾一新,穿街过巷去趟良乡。路上,如果有人问我:“干吗去呀?”我想,我会自豪地回答说:“现——去!”